

高邮王氏父子的语言观刍议

陈艳龙¹, 钱宗武²

(1. 盐城工学院 外语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51; 2. 扬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2)

摘要:清代是我国古代语言研究的巅峰时期,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则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王氏父子的语言成就与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其正确的语言观密不可分。王氏父子语言观的研究对于总结我国古代语言学术思想,指导今天的语言研究实践仍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王念孙;王引之;语言观

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5)01-0043-04

语言观是人们对语言的根本看法和认知。语言观具有差异性,因人而异,因时空变化而异。“不同的语言观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理论,产生不同的语言研究方法,追求不同的语言研究目标和结果。”^[1]清代是我国古代语言研究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名家辈出,众多的学者在文字、语义、语音、语法(以虚词研究为主要特征)研究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梁启超言:“然则诸公曷能有此成绩耶?一言以蔽之曰: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已。试细读王氏父子之著述,最能表现此等精神。”^[2]“王氏父子”即高邮的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时称“高邮二王”,以其精湛的学术睥睨一代。其采用科学的语言研究方法,取得“高邮王氏一家之学,海内无匹”^[3]的成就。王氏父子的语言观主要体现在他们对语言的本质、语言的历史性、语言的功能性以及系统性的远见卓识。本文限于篇幅,仅探讨其对于语言本质的正确认知。

一、音义关联是语言的本质属性

语言首先表现为人们的语言活动,它包括作为形式的语音和作为内容的意义两个方面,有声的语言通过语音的形式传递语义的内容。远古时代由于技术手段的匮乏,语音无法实时保存。文字发明后,人们将语言形成于文字,保存于典籍中。典籍成了解读古人思想最重要的凭藉。解读典籍须经文字,通过文字的形体来诠释意义被人们视为唯一的路径。但由于文字形体自身的发展

变化及流传中造成的讹错,以及古今文、异体文、通假字的存在常常导致释义的失真,造成“望文生训”和“以文害义”的弊病。

这样,从另一个路径建立声音和意义的联系就显得极为重要。文字和声音有没有联系呢?一方面,语音形式的所指和表达意义或概念的能指之间有着必然的、天然的联系。因为语言从根本上来讲是语音和语义的结合,是能指和所指构成的符号系统。没有脱离意义内容的语音,也没有离开语音形式的语义。两者相互依存,互为表里。另一方面,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其出现必然晚于语音,且文字形体与语义两者之间的关联也不如语音与语义两者之间关系紧密。因此,对语义的探求最重要的依据莫过于语音。而文字作为语音的记录形式,自然可以架构起能指和所指的桥梁,实现语音和语义的贯通。即“然造字之始,既以声寄义,故两字所从之声同,则字义亦通,即匪相同,亦可互用。”^[4]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王念孙在《广雅疏证·序》中提出“训诂之旨,本于声音。”^[5]训诂旨在达义,而义存乎声。这种训诂思想在其子王引之的著作中也很频仍。“夫古字通用,存乎声音,今学者不求诸声,但求诸形,固宜其说之多谬也。”(《经义述闻》卷三“平章百姓条”)^[6]夫训诂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声之相同相近者,义每不相远。”^[7]

二、义寓于声,对语言本质的深刻认知

语言分为有声的口头语言和有形的书面语

言,口头语言先于书面语言,书面语言是口头语言的记录,但在时空的变异中,有声的语言和有形的语言渐渐产生偏离,即“字有更革,音有转移”。变化是永恒的,但是人们说话总要表达思想和意义却是不变的,亦即音义的联系也是永恒的;所以“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7]

那么语音和语义之间的这种必然的、天然的联系有没有理论根据呢?辜正坤在其构建的“汉语音义阴阳同构律”中这样认为:“大量汉语字词的发音与其所代表的含义具有某种心理——生理——物理方式的契合。典型地说来,在大量呈阴阳对立意义或级阶意义的汉语字词群组中,凡意义相对昂扬奋发、时空关系及含义指向都呈正向扩张型的字,其读音多响亮、厚壮,双唇发其音时的开口度都相对较大;反之,凡意思相对收缩、压抑、呈负向退降的字,其读音多沉闷、拘谨,发音时双唇开口度都相对较小……音义同构现象论试图揭开语言的起源并为训诂学中最精妙的声训方法(因声求义方法)提供科学的可以把握的理论依据。”^[8]这是从语言认知的象似性角度来论证音义联系的理据。刘师培在论文《字义起于字音说》也曾论述道:“字义起于字音,非惟古文可证也。试观古人名物,凡义象相同,所从之声亦通。则以造字之初,重义略形,故数字同从一声者,即该于所从得声之字,不必物各一字也。”“汇而观之,则知古人制字,字义寄于所从之声。就声求义,而隐谊毕呈。”^[9]据此可见,音义联系不无凭据,其既有文字的和古人名物的证据,又有心理的生理的和物理的证据。

三、因声求义,理论和方法的结合

古人在把语言记录成文字时,为了追随思想的流动,往往来不及仔细考虑何为借字,何为正字,而一味按照语音把想要表达的意义录成文字。后人如能从语源方面找到两者的内在联系,也就找到了形异声同的训诂规律。因此,为王氏父子所大力提倡并用于指导语言实践的“因声求义”既是理论,又是方法,反映了清代语言学家对语言“形、音、义”三个要素的正确认识,抓住了三者关系中的核心联系。

王引之在《经义述闻·序》中云:“大人曰:‘训诂之旨,存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

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焕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诂鞠为病矣’。”^[12]此句一语道破文字的实质,即文字只是记录声音的符号,是形式。语言首先是指有声的语音,然后才有书面的文字,有声的语言总是要表达一定的思想和意义。王氏父子的方法和实践可谓抓住了语言的根本所在。徐通锵认为:音义结合是语言符号的一种最基本的性质,也正由于此,语言符号中的音义关系也就成为语言研究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但也是最复杂的问题。”^[10]虽然我国古代的语言学家很早的时期对音义的联系就有所认识,如汉代刘熙所著《释名》以音同音近的字解释词义,追溯语源。但是,王氏父子对声音和语义关系的认识显然代表了我国古代学者对语言本质认识的高度。“其发明以声音穿串训诂之法,则继往开来,成小学中不祧之祖。”^[11]

四、因声求义指导语言实践

“以古音以求古义”,或简言之,“因声求义”,是王氏父子训诂实践中依据的主要方法。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一解释词义;二破释通假字;三解释连绵词;四探求语源。兹一一举例说明如下。

1. 解释词义

殷,大也。下引疏证《丧大记》:“主人具殷奠之礼。”郑注云:“殷,犹大也”《庄子·秋水篇》云:“夫精,小之微也;埶,大之殷也。”微,亦小也;殷,亦大也。《山木篇》云:“翼殷不逝,自大不覩”。《楚辞·九叹》:“带隐虹之透虵”。王逸注云:“隐,大也”。隐与殷声近而义同。(《广雅疏证·释诂一》)

按:“殷”有“大”义,而“隐”与“殷”上古韵皆在“文”部喉音“影”母字,声调前平后上;按照“声近声同其义亦通”的理论,推理可知“隐”亦有“大”义。

啓,踞也。下引疏证《尔雅》:啓,跪也。《小雅·四牡篇》:不遑啓处。《毛传》训与《尔雅》同。跪与踞皆有安处之义,故啓训为跪,又训为踞。《采薇篇》又云:不遑啓居。啓、踞声亦相近。《说文》:居,蹲也;踞,长跪也。居、踞、踞、啓、跪,一声之转,其义並相近也。(《广雅疏证·释诂三》)

按:“居、踞、踞、啓、跪”诸字形异而义近,是“声转义近”理论的体现。其根据就在于“居”、“踞”上古韵同为“鱼”部“见”母字,声近义同;

“𪔐”为“之”部“群”母字;“啓”为“脂”部“溪”母字;“𪔐”为“微”部“群”母字,五字在上古发音部位相同,都是牙音,它们之间存在声转联系,因而意义也相近。

王氏父子的“‘声同’之‘声’将声纽的‘声’和字音,即声和韵整个的‘音’都包括在内了。‘声同既可指字与字的声纽相同或相近,又可指字与字的整个读音相同或相近。’^{[12]108}凡王氏专书中言及“声同、声近、声相近、同声、同音、音通……”处,皆是阐释“声近义同”、“声转义近”理论的辞例,利用音韵相协的办法解决词义的解释问题。

2. 破释通假字

通假字的训释在中国古代语言研究中一直是个难点,也是争论最多之处,其根源在于对通假的认知不够,拘于字形。

《史记·日者列传》:“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索隐》曰:“谓卜者自矜誇而莊嚴,说祸福以诳言也。”念孙按:“矜誇”“莊嚴”事多不相类,“嚴”读为“嚴”。(《读书杂志·史记第六》)

按:王念孙读“嚴”为“讖”,“多言誇嚴”即“多言誇讖”。“嚴”“讖”均从敢声,得以通借。司马贞不能识辨以文害辞。正如王引之说:“至于经典古字声近而通,则有不限于无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见存而古本则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辞。”^[6]值得一提的是,王氏父子眼中的假借与前人的假借在意义上有所不同。王引之说:“许氏《说文》论六书假借曰:‘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盖无本字而后假借他字,此谓造作文字之始也。至于经典古字声近而通,则有不限于无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见存,而古本则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6]。由此可见,前人所谓假借实为造字之法;而王引之认知的假借是一种同音替代,纯粹用于语音记录。这表明王氏父子的确吃透了语言以声音表达语义(思想),文字以形体保存声音的语言最重要的本质特征。

3. 解释联绵词

联绵词,又称连语、连字、联绵字,多为双音词,是汉语中存在的特殊语言现象。联绵词两个音节合用构成一个语素,整体表达意义,其中两个音节多存在双声或叠韵的关系。训诂中如果将其分开解释则失去意义关联,导致穿凿附会,让人费思难解。联绵词的词义演变往往伴随有规律的声

韵流转。古代许多语言学家对联绵词的这种性质缺乏正确的认识,随意对其进行拆解分析,望文生训,失之穿凿。而王氏父子由于对“义存乎声”有着正确的认识,能够跳出联绵词形体变化的陷阱,采取科学的方法,即音求义,得出正确的解释。

嫌疑、狐疑、犹豫、踟蹰,皆双声字。狐疑与嫌疑,一声之转耳。后人误读狐疑二字,以为狐性多疑,故曰狐疑;又因《离骚》“犹豫”、“狐疑”相对成文,而谓“犹”是犬名,犬随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来迎候,故曰犹豫;或又谓“犹”是兽名,每闻人声,即豫上树,久之复下,故曰犹豫。或又以豫字从象,而谓犹豫俱是多疑之兽。以上诸说,具见于《水经注》、《颜氏家训》、《礼记正义》及《汉书注》、《文选注》、《史记·索隐》等书。夫双声之字,本因声以见义,不求诸声而求诸字,固宜其说之多凿也。”(《广雅疏证》卷六上)

按:此条训释中,王氏指出前人据形索义,拆分连语,以形害义的积弊。王氏指明“大氏双声叠韵之字,其义即存乎声,求诸其声则得,求诸其文则惑矣”“凡连语之字,皆上下同义,不可分训。”^{[13]20}连语的形成是连音为词,求解是“依声托事,形无定体”^{[13]26}。王氏洞察联绵词的本质,能够透过字形演变的现象,对声韵的流转、形体的演变以及意义的整体性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也是他们在联绵词的训释中得以超越前人的根本原因。

4. 探求语源

王力先生在《同源字典·序》中指出:“同源字的研究,其实就是语源的研究。”^[14]王氏父子虽未对同源词进行专门研究,但是因其对音义关系的谙熟及对语音转化规律的把握,因此在同源词的研究上的创获也非常人所及。以《广雅疏证》为例,该书一共使用了九种音转术语(一声之转、声转、转声、声近而转、转、转为、转之为、语转、语之转),“共使用四百二十六次。”^{[12]125},其中又以“一声之转”为多,说明字词同源关系。

质,正也。准、质、正,又一声之转,故准、质二字俱训为正也。(《广雅疏证》卷一上)

按:“准、质、正”上古声纽皆为舌音“端”母字,韵部分别为“文、质、耕”。此三字声母相同,韵母不同,因此是声同而韵远转的关系。

剖、判、劈、辟,分也,一声之转。(《广雅疏证》卷一上)

按:“剖、判、劈、辟”上古声纽皆为唇音“滂”

母字,韵部分别为“之、元、锡、锡”。此四字声母相同,韵母相近,因此是声同韵之转。

剿、刖,一声之转,皆谓割断也。(《广雅疏证》卷一上)

按:“剿”、“刖”上古声纽皆为牙音“疑”母入声字,韵部同为“月”,二者是同声韵之转。

自《说文》以来,“据形索义法”一直是古代语言研究者进行语义研究的主要方法,但是一味拘泥于形体来探究词义和语源,难免会堕入望文生义的陷阱。文字使用和流传过程中的形误、异体、假借等现象常常造成了形义关系的脱节、失联。有的形存义失,有的义存形失,仅从形体本身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和解决问题,必须突破字形

的束缚,通过语音的线索去探求意义。王氏父子大力提倡、不断阐述和应用与实践的利用古音声同声近来探求语源的理论与方法,有效地克服了汉字形体数千年的演变而造成的形义失联,重新架构起音义之间的联系。正是基于对语言音义关系的正确认识,王氏父子克服了既往语言研究中望文生义的弊病,在同源词、通假词、联绵词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前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成就。王力先生认为段玉裁、王念孙冲破中国文字研究重形体疏声音控制中国文字学一千七百年的藩篱,是训诂学上的革命,把训诂学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15]。

参考文献:

- [1] 潘文国. 语言的定义[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1(1): 97-101.
- [2]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45.
- [3] 阮元. 王石臞先生墓志铭. 研经室续集[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7: 94.
- [4] 刘师培. 字义起于字音说. 清儒得失论; 刘师培论学杂稿[C].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148-149.
- [5] 王念孙. 广雅疏证[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0: 1.
- [6] 王引之. 经义述闻[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0: 85.
- [7] 段玉裁. 广雅疏证[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0: 1-2.
- [8] 辜正坤. 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73.
- [9] 刘师培. 清儒得失论; 刘师培论学杂稿[C].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148-149.
- [10] 徐通锵. 基础语言学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16.
- [11] 黄侃. 文字声韵训诂笔记[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7.
- [12] 张其昀. 《广雅疏证》导读[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 [13] 王念孙. 读书杂志[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0.
- [14] 王力. 同源字典[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9.
- [15] 王力. 中国语言学史[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129.

Tentative Discussion on Wang Niansun and Wang Yinzhì's Linguistic Outlook

CHEN Yanlong¹, QIAN Zongwu²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Jiangsu 224051, China; 2. School of Liberal Art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2, China)

Abstract China's traditional linguistic research peaked during Qing Dynasty. Wang Niansun and his son Wang Yinzhì were among the most prominent linguists of the period. Their outstanding accomplishment in linguistic research is inseparable from their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correct outlook on language. It is, therefo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umming up China's historical linguistic thoughts and directing the current linguistic research to explore their linguistic outlook.

Keywords: Wang Niansun; Wang Yinzhì; Linguistic Outlook

(责任编辑: 沈建新)